

みんなのポジトリ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The Hakka of Sabah : Multi Sited Studies on Immigration, Identity,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18-04-03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河合, 洋尚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15021/00008991

马来西亚沙巴州的客家人 ——关于移民、认同感、文化标志的多地点考察

The Hakka of Sabah:
Multi-Sited Studies on Immigration, Identity,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河合 洋尚

KAWAI Hironao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The Sabah state of Malaysia, a subgroup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Southeast Asia, is a district with a high percentage of Hakka individuals. Most studies on the Hakka of Sabah have focused on immigration, land use, and occupation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ittle has been discussed in terms of cultural recognition and trans-national networks in the 21st century. In consideration of this problem, I conducted fieldwork in the Hakka associations and the Hakka villages of Sabah, while considering the community's social networks with China and Taiwan. This investigation was a part of my multi-site work. Based on this study, this paper reveals how immigration, identity,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ffected the Hakka of Sabah. Firstly, most of the Hakka community in Sabah see the Baoan dialect as the 'standard' Hakka language, and consider those who speak Baoan dialect as the Hakka. Secondly, the Hakka of Sabah are conscious of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group and other Chinese groups. They often recognize aspects of other cultures (e.g. local gods, clothes, foods, houses, or *tulou* architecture) as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 Finally, they generally emphasize their ancestors' place in China because they see the Hakka as a dialect group. The Hakka of Sabah often visit places with Hakka characteristics (e.g. *tulou* architecture), except for some wealthy persons who return to the Chinese homeland with honor. This paper shows how to perceive the Hakka diaspora in relation to China.

序言

东南亚有很多华人，但多数民系是福佬人或广府人。客家人在东南亚各国并不是人口最多的华人，但近十年前笔者在日本查资料时得知，马来西亚沙巴州的情况与其他东南亚地区不同，该地区的大半华人是客家人（山下 1987: 80; 上東 2004: 249-251）。由于日本和中国大陆几乎没有沙巴客家方面的历史研究和民族志研究，当时我还不不太了解沙巴客家人的情况，如他们是在什么时候、为什么要从中国移民，他们的主要祖籍地在中国哪里，他们是否有强烈的客家意识，或者

沙巴典型的客家文化是什么等。

2012年8月我得到研究经费,通过日本首都大学(东京)的伊藤真教授和马六甲大埔会馆的介绍,在首都亚庇、山打根、根地咬、丹南进行了考察¹⁾。我在当地买到了张德来先生写的《沙巴的客家人》(张2002)一书,收集到当地资料。后来在香港找到了香港和台湾的学者写的相关论文。通过田野考察和文献研究得知,沙巴确实是华人社会中客家人占优势的地区。这里的客家人持有作为客家人的认同感,讲客家话。但是,他们的“标准客家话”不是梅县方言而是宝安方言。这里的所谓“客家文化”与一般在广东被想象的有一些差异。

笔者从2003年开始在中国粤闽赣交界的客家地区进行田野考察的过程中得知改革开放后马来西亚等东南亚诸国的客家华侨回国捐款和建设故乡景观的情况。可是,由于目前中国汉族研究和华侨华人研究少有沟通,研究客家的人类学者并不很了解当代东南亚客家人的现状和中国-东南亚之间的客家网络。因而,笔者感到需要开始在东南亚客家社会进行实地考察,具体采用多地点考察²⁾。根据马库斯的说法,人、物质、情报等并不在一个地点,而是在全球上流动。因此,人类学家为了解全球现象主要在几个相关的地点进行实地考察。他将这种考察方法称之为多地点考察(Marcus 1995)。

当然,现在已经有一些关于沙巴客家人的相关成果。但是,其中的重要成果,如张德来、黄子坚等马来西亚籍学者以及香港的李立刚牧师等基本上从历史学的角度论述过19世纪到20世纪前半期的情况,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进行探讨的研究成果则并不多见。鉴于这种情况,本文从多地点考察的视角考察沙巴客家人的源流、认同感、文化标志,以及与马来西亚-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1. 沙巴和华人的概况

1.1 沙巴及其民族概况

东南亚的马来西亚由半岛部分和岛屿部分构成,前者被称之为东马,后者被称之为西马。西马分为两个地区,西部叫做砂拉越州,东部叫做沙巴州。沙巴的东边有菲律宾的岛屿。过去的沙巴是菲律宾海上民族的领土,1877年英国殖民占领该地后,1963年马来西亚独立时作为一个州成立。但是,菲律宾仍然主张沙巴州的领土权。

沙巴的面积是约74,000平方公里,约占马来西亚国土的22%。1881年英国殖民时代英国北婆罗洲渣打公司(North Borneo Chartered Company)把北部的古达(kudat)作为首都,但因海上民族经常袭击,1883年把首都迁移到东部的山打根(Sandakan)。20世纪30年代山打根成为世界最大的木材出口港,被称为“小香港”。但二战时期日本殖民沙巴时山打根被联合国军的空袭破坏,1946年英国重新殖民沙巴时把亚庇(Kota Kinabalu)作为新的首都。后来沙巴的首都一直在亚庇。

沙巴的人口约140万人,其六成人口信伊斯兰教(長津2006: 45-69)。沙巴的民族由马来系的卡大山(kada-zan)族、杜顺(Dusun)族、巴夭(Bajau)族、毛律(Murut)族以及华人等



图1 沙巴地区图

本图出处：《亚庇客家公会四禧庆典纪念特刊》，第2页。

构成，其中最大的民族是卡大山族³⁾。根据1891年的人口调查，北婆罗洲的人口约6.7万人，其中卡大山等马来系民族占多数，华人口7,156人，占约12%。当时大部分的华人居住在古达和山打根（上東 2004: 245）。1947年沙巴人口331,361人中，华人口是59,610人，约占18%。后来，沙巴的华人口约占20%左右（上東 2004: 247）。虽然沙巴最大的宗教是伊斯兰教，但是华人很少信伊斯兰教，信基督教、天主教、佛教或者民间信仰的比较多。

1.2 沙巴的华人和客家人

在沙巴，从19世纪开始，人口最多的华人就是客家人。就像在下文提及的，这跟历史因素相关。根据1921年的人口调查，北婆罗洲的39,256人华人中，客家人是18,153人，广府人是12,268人，福建人是4,022人，潮汕人是2,480人，海南人是1,294人，其他华人是1,039人。包括现在的砂拉越地区范围，客家人占约46%，是华人中人口最多的族群。在马来西亚独立之前，客家人在北婆罗洲占最多的人口比率，如1931年客家人占54.8%，1951年占59.9%，1960年占53.8%（Jones 1962; Han 1971）。1963年沙巴州成立后客家人还是最大的华人族群。根据1970年的统计，沙巴的138512人华人中，客家人是78,500人，广府人是22,365人，福建人是16,706人，潮州人是7,631人，海南人是6,420人，其他华人是7,890人（上東 1999: 58）。直到现在客家人在沙巴华人中占的比率仍在一半以上。

由于客家人在华人族群中人口最多，不管属于什么民系，沙巴的绝大部分华人会说客家话。我在亚庇进行考察时绝大部分华人会说华语（普通话）、客家话、马来语3种语言。不少华人还会说英语和广东话。特别是山打根的华人经常说客家话和广东话。但是，沙巴的“标准客家话”与梅县的客家话稍微不同，与香港、深圳、东莞一带的客家话比较接近。正如下文的叙述，沙巴

州的很多客家人把惠州府作为祖籍地，老一辈的部分客家人还会说龙川话、紫金话等惠州府范围内的方言。可是，由于这些方言与“标准客家话”很难沟通，他们平时用后者进行交流。现在绝大部分的年轻一代客家人不会说龙川话、紫金话等方言。他们在学校用马来语和华语上课，下课后用客家话、广东话等。不少年轻一代客家人会说华语客家话等但不太会写汉字。

2. 沙巴客家人的源流与移民

2.1 沙巴客家人的移民史

那么，为什么沙巴有那么多的客家人？这与客家人的移民史相关联。

18世纪随着华人到东南亚移民增多，部分客家人开始移民到婆罗洲，主要从事矿业开发。特别是1777年梅县人罗芳伯在婆罗洲西部开兰芳公司，不少客家人在婆罗洲西部及其周围从事矿业。然而，目前很难找到当时在婆罗洲东北部客家人的资料，一般认为太平天国起义结束后才有一些客家人移民到沙巴。据说他们逃避到沙巴的山区，但目前还没找到相关史料（饶 2002: 68-72）。根据现有的史料记载，1881年英国北婆罗洲渣打公司（以下简称为英国渣打公司）统治沙巴之后大量客家人才移民到沙巴。

沙巴客家人的移民史与巴色会有密切关系。英国渣打公司初代总督特查（W. H. Treacher）因欣赏华人的劳动能力而招募华人劳动者。1882年他派麦哈斯（W. Medhurst）到香港跟香港巴色会的传教士黎力基（R. Lechler）商量，看是否有华人愿意去沙巴工作。之后，黎力基牧师到五华、龙川、紫金、宝安、花县各地招募愿意去海外工作的巴色会信徒，1883年4月4日他派了96位客家人去沙巴（李志刚 1994: 241-252）。1888年香港巴色会西营盘崇真会的李祥光牧师也带了100位客家信徒去古达在沙巴设立巴色会的教会（汤 2002: 20）。巴色会是瑞士的基督教会，在中国南部传教的过程中在香港设立南会、在五华县樟村设立北会，主要针对客家人进行宣教活动。因而，早期到沙巴的大部分华人是客家人。

20世纪前半期巴色会继续派客家人的信徒到沙巴从事开发。可以说，巴色会成为了为英国渣打公司介绍客家劳动者的中介机构。另外，不少客家人因在中国大陆贫困而靠亲戚、朋友关系移民到沙巴。因为早期到沙巴的华侨是客家人，所以自然客家人增多。根据历史学家黄子坚的研究，1903年前大约2000位华人移民到沙巴，其中991位是客家人，568位是广府人。1906年到亚庇的华人有884名，其中大部分人是靠亲戚关系到沙巴从事农业的客家人。1908年沙巴在农场工作的华人是6,166名，其中大部分也是客家人（Wong 1998）。

由于客家人到沙巴的移民史与巴色会有密切的关系，绝大部分沙巴客家人的祖籍地也是巴色会的传教范围——从宝安、东莞、花县到惠东、紫金、龙川、五华一带。换句话说，大部分的沙巴客家人是东江客家人。除了五华之外，从现在的梅州地区和潮汕地区（包括揭西）移民的客家人不多，这种情况与台湾、新加坡、西马等不同。但是沙巴也有部分大埔出身的客家人。从居民的口述史和族谱判断，沙巴的大部分居民来自这些地区。

2.2 沙巴客家人的分布以及祖籍地

客家人移民到沙巴时先到古达或者山打根后再去各地。根据1951年的报告，沙巴的大部分华人住在山打根、亚庇等城市，沙巴的16个城市中华人占的比率约70%。61%的华人住在古达、山打根、亚庇、斗湖（Tawau）、纳闽（Labuan）5个城市（Han 1971: 73-79）。不用说这些华人的最大集团是客家人。除了这些城市外，客家人到沙巴的各地，至少在13个城市设立了客家公会。关于沙巴客家公会的基本信息，请参见表1。

表1 沙巴的客家会馆

名称（旧称）	所在城市	成立年代
山打根客家公会（鹅城会馆）	Sandakan	1886年
亚庇客家公会（北婆罗洲西海岸客属会馆）	Kota Kinabaru	1940年
吧巴客家公会	Papar	1964年
保佛客家公会	Beaufort	1964年
根地咬客家公会	Keningau	1964年
丹南客家公会	Tenom	1964年
斗湖客家公会	Tawau	1964年
古达客家公会	Kudat	1965年
斗亚兰客家公会	Tuaran	1965年
拿篤客家公会	Lahad Datu	1983年
兰瑙客家公会	Ranau	1990年
纳闽客家公会	Labuan	1995年
古打毛律客家公会	Kota Belud	2005年

信息出处：张德来2002《沙巴的客家人》，第61-72页。根据现场考察，笔者加上了2005年成立的古打毛律客家公会。据说2018年现在沙巴还有必打丹客家公会和兵南邦客家公会。但笔者还没进行实地考察。

看表1就知道，19世纪末沙巴已经有客家公会，这是东南亚最早的客家团体机构之一。但是，这个会馆当初叫做鹅城会馆，还没用“客家”两个字。估计当时的华人之间还没有客家这个概念。山打根是客家人在沙巴最早到达的城市。惠州人欧世珠、吴德声等人受到同乡的支持创立鹅城会馆，加强感情、提供福利。1941年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会长胡文虎派林师万和丘洁夫到山打根提倡设立客家公会，但因战争关系未能实现。1955年鹅城会馆才挂上“客属人和会馆”的牌子。当时山打根的客属人口约有2万人，大多数客家人从事农业（北婆罗洲客属公会特刊编辑委员会1957: 35-36）。1960年改成山打根客家会馆（照片1，2）⁴⁾。

实际上在沙巴首次用客家（客属）概念成立的会馆是亚庇的北婆罗洲西海岸客属会馆。它是亚庇客家公会的前身。根据我在亚庇客家公会收集的《北婆罗洲客属公会新会所开幕纪念特刊》，1940年1月新加坡南洋客属公会的凌超元带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一书推进在北婆罗洲巴组织客属公会。同年11月客家人在亚庇创立北婆罗洲西海岸客属会馆，1957年在亚庇的唐人街设立现在的会所。设立新会所时此所的相关人员编辑了《北婆罗洲客属公会新会所开幕纪念特刊》，罗香林教授、香港崇正总会、侨港惠州同乡会、侨港惠阳商会、马来西亚下霹雳客属公会、印尼占



照片1 山打根客家会馆
(2012年, 笔者摄影)。



照片2 丹南客家会馆
(2012年, 笔者摄影)。

碑客属公会等在该书写了题词。从此书的记载得知, 当时的沙巴客家团体已经与香港、印尼、西马等客家团体有联系(北婆罗洲客属公会特刊编辑委员会 1957)。1963年成立马来西亚沙巴州后两三年之内在古达、斗亚兰、吧巴、保佛、根地咬、丹南等在西部陆续成立客家公会。接下来,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成立了四所会馆。

据载, 客家人到沙巴西部海岸的时间大概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1897年一些客家人到保佛, 后来从保佛到根地咬、丹南等内陆移民开发。其中, 根据根地咬客家会馆的介绍, 根地咬的人口约10万人, 其中华人占40%左右(客家人占12%), 卡大山、杜顺族和毛律族等原住民是35%。最初客家人到根地咬移民的时期是20世纪初。1905年有的惠阳人移民到根地咬时只有10位华人。1911年在沙巴西部通铁路后很多客家人到根地咬移民(北婆罗洲客属公会特刊编辑委员会 1957: 66-68)。

另一方面, 首次到丹南移民的不是客家人而是做生意的福建人。可是, 1912年巴色会的传教士从古达带客家人移民到丹南后, 这里的客家人增多。之后, 他们从古达、保佛、山打根等地区靠亲戚关系不断移民到丹南⁵⁾。根据丹南客家公会的介绍, 2012年丹南约有五万人口, 多数民族是毛律族。丹南的华人人口大概是五-七千人, 其中约80%是客家人, 其他20%是福建人、海南人等。并且, 这里的年轻一代福建人、海南人等已经忘记自己的方言, 只会说客家话和华语。可以说, 丹南是华人中的客家比率较高的地方。据当地人说明, 丹南的大部分客家人在二战前已经在此定居。

2012年8月我到山打根、亚庇、根地咬以及丹南进行田野考察时发现, 他们的祖籍地稍微不同。虽然他们基本上都是从广东中部和东部移民的客家人, 但是居民的祖籍地不同, 其居住地区会有差异。例如, 山打根的客家人特别在初期从惠州、惠阳一带移民, 所以他们重视的文化与惠州一带的有密切的关系。山打根客家的多数把惠州、惠阳以及宝安当作祖籍地。另一方面, 丹南客家最多的祖籍地是龙川和紫金, 特别是姓杨的大部分人是龙川雅寄人。亚庇的客家人从宝安、惠阳、龙川、五华等地过来, 但亚庇东部的客家地区下南南(Inanam)、孟家达(Menggatal)、德里福(Telipok)一带的大部分华人都是五华人⁶⁾。



照片3 第15届沙巴客联会的会场和麒麟舞（2012年，笔者摄影）。

由此，我们不能把所有沙巴客家人的文化看做铁板一块。其实，沙巴各地的客家文化根据地区的不同而有差异。但另一方面，他们有时持有同样的客家认同感和文化标志，三年一次沙巴客家人共同举办沙巴客联会（照片3⁷⁾。下文我将根据在山打根、亚庇、根地咬、丹南进行的考察成果论述沙巴客家人的认同感和文化标志。

3. 沙巴客家人的认同感和文化标志

3.1 沙巴客家人的语言和认同感

由于沙巴客家人来自广东的不同地方，他们的方言原来就不同。例如，我在丹南访谈时当地的老人家都说他们的祖先很多从龙川、紫金一带移来，他们的上一代经常说龙川话、紫金话等方言。可是，现在70岁以下的大部分人不会说这些方言。在丹南，60多岁的A先生说，他的祖籍地是紫金，但他只会说“标准客家话”，去中国紫金时很难与亲戚沟通。他以前几乎听不懂紫金话，经常用华语跟紫金的亲戚对话。另外，80多岁的B先生说，他在家中跟父母说龙川话，但在外面用“标准客家话”或者华语沟通。B先生回忆，他在读华文小学的时候也有不同出生地的同学，在学校用“标准客家话”或是华文，回家后才用龙川话跟家人沟通。可以说，上个世纪30年代已经在内陆部的丹南也普及“标准客家话”，至少二战后龙川话、紫金话等方言淡化。

如上所述，沙巴的“标准客家话”不是梅县话而是宝安客家话。据我所知，世界客家社会不一定把宝安客家方言作为“标准客家话”，一般梅县方言被认为是标准客家话。那么，为什么沙巴的“标准客家话”是宝安客家话，至今未出现详细的研究成果。但是，我认为我在亚庇考察的过程中C先生提及的看法是值得参考的。C先生是丹南出生的基督教牧师，本身是龙川客家人。C先生认为，沙巴的“标准客家话”是宝安客家方言的原因与巴色会的传教过程相关联。也就是说，由于巴色会、特别是派很多客家人到沙巴的南会的本部在香港，巴色会在香港以及沙巴传教的时候用宝安客家方言传教。香港的客家话也与宝安客家方言很接近。确实，我在沙巴访谈的老人家都回忆说，他们在小时候听到的牧师的说教也是宝安客家话，与C先生说的一致。也许沙巴的“标准客家话”是宝安客家方言的理由可能与巴色会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过程有密切关系。

随着语言使用状况和寻根意识的变迁,他们的认同感也会变化。B先生说,他和他周围的朋友在小时候就已经有了强烈的客家意识。因为,他们已经使用“标准客家话”,这个语言明显与广府话、闽南话等不同。当然,他在家使用的龙川话也与“标准客家话”不同,但相对来说与客家话比较接近,所以他们在小时候已经认为龙川话是客家话的一种。根据B先生所说,20世纪30-40年代丹南的不少人用龙川话等方言,但至少二战后大部分客家人主要使用“标准客家话”以及华语。我在亚庇和山打根的田野考察显示基本与上所述一样,至少大概50年代后他们主要用“标准客家话”、华语、广府话、马来语等语言,很少用祖籍地的方言。加上沙巴不少50岁以下的人已经不知道自己的祖籍地在哪里。我在亚庇访谈D女士(2012年访谈时40多岁)时,她说她从小知道自己是讲客家话的客家人,但不知道她的祖籍地在哪里。D女士说,她们在学校学习的语言是华语、英语、马来语3种,连“标准客家话”都不说。虽然她们在家里听父母说“标准客家话”,她们自己也会讲,但是一般不知道她朋友是否是客家人,有时听到她朋友的父母说“标准客家话”才发现是客家人。可以说,因为现在沙巴的中年人与年轻人不太清楚他们的祖籍地,所以他们已经没有“宝安人”、“龙川人”、“紫金人”等按地区的认同感,经常按语言的范围认同谁是“客家人”还是其他华人。我记得在丹南的郊区考察时有的中年男性说他的祖籍地在广东。我问他的祖籍地具体在广东的哪里时他,回答说是广东的“客家村”。他还说不知道“客家村”具体在广东的哪里,但上一代告诉他讲客家话的人就是从“客家村”过来的。可以说,只要他们的父母、祖父母是主要说“标准客家人”的华人,他们就认为自己是客家人。

值得注意的是,沙巴客家人至少在30年代有过强烈的客家认同感。他们的主要祖籍地是东江流域一带,但在广东做过田野考察的人类学家很清楚东江流域一带的居民在90年代之前不一定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是客家人的身份。例如,日本人类学家濑川昌久根据在惠州、河源地区(包括龙川、紫金)的考察指出,80年代当地确实存在“客家”的说法,但与现在的意义不同,指住在山区的居民。不少惠州、河源的居民否定自己是“客家人”,说“客家人”住在很远的山区(濑川1993: 91-92)。甚至我在2008-2010年在河源地区考察时不少人说“我以前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我们不是客家人,我们就是河源人或者东江人”等(河合2012: 142-144)。但另一方面,沙巴的客家人已经不强调中国的出身地区,而强调作为方言集团的自己——客家人。

沙巴的客家人本来有不同的源流、方言以及文化,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开始追求同样的标志。例如,我拜访亚庇和山打根时不少客家人跟我说,他们的祖籍地在哪里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是客家人。我在山打根时30多岁的E先生告诉我:“我也不知道我的祖籍地在哪里,甚至没想过去祖籍地寻根。要是我们华人去祖籍地,中国的亲戚一定期待着我们捐款,但我们不一定有钱。寻根是一部分有钱人或者有权威的人才有心情做的。我们年轻一代的客家人根本不关心我们的祖籍地在哪里,只要知道我们是客家人,我们是中国人就可以”。确实,我们拜访沙巴的客家公会时这些机构的团体中国游不是去广东的祖籍地而是去宁化石壁或者永定的土楼。根地咬的某个老干部也说:“听说我的祖先从五华来,但不知道五华在哪里。我不知道资料上写的地址是否真实,并且这个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起源于中原的客家人,经过福建、广东来到沙巴的事实。福建的土楼代表我们客家人对外敌防卫而迁移的历史。我们都认为拜访永定的土楼和宁化

比拜访我们的祖籍地还重要，因此2009年我们组织了中国寻根旅游团去永定和宁化”⁸⁾。

沙巴大埔人的个案也值得一提。在沙巴，绝大部分的客家人是从宝安到五华的范围来的移民。几乎没有从梅县、龙岩、赣州地区移民来的客家人⁹⁾。但是，关于梅州地区，五华和大埔是例外，不少大埔人到沙巴移民。1969年沙巴的大埔人在亚庇创立沙巴大埔会馆，现在约有300人左右的会员。现在大埔会馆属于客家团体的一个机构，与各地的客家会馆有密切的关系。然而，根据大埔会馆的会长黄长水先生所说，以前在沙巴大埔人不被认为是客家人¹⁰⁾。并且，虽然他们一直都认为大埔人是“客人”，可是以前不叫“客属”，在客家人之间是特殊的存在。可是，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大埔人都认为大埔人是客家人，他们后来作为客家人参加活动。现在他们举行活动时做客家菜等与客家人相关的活动，但他们重视的客家菜等文化不一定在中国的大埔存在着。而且，他们还在会馆里挂永定圆形土楼的照片。沙巴大埔会馆可以说是唯一的地方性客家团体，但另一方面追求没有地方性的所谓客家文化标志。

3.2 沙巴客家人的文化标志

那么，沙巴客家人的族群文化标志是什么？不管沙巴客家人是来自广东何地的移民，他们一般认为客家人有与其他华人不同的共同文化。虽然沙巴客家人认为的所谓客家文化根据地区稍微不同，但他们想象的共同文化支撑着客家族群本身的存在。根据我在山打根、亚庇、根地咬、丹南的考察经验，下文将从服装、饮食、建筑、信仰几部分介绍沙巴各地客家人所认为的客家文化。

(1) 服装

在沙巴，客家人一般被认为是从事农业的华人。这可能与沙巴客家人初到此地时主要从事农业有关。虽然现在的客家人从事很多种职业，但被认为传统客家文化的不少因素与农业相关（照片4，5）¹¹⁾。其典型的例子之一是客家服装。

现在沙巴客家人基本上穿洋服，与其他华人没什么不同。但是，客家人有时认为他们的传统服装有客家特色。特别是由于以前客家人男女都从事农业，客家女性从事农业时穿的服装被认为有客家特色。比如说，客家妇女从事农业时穿的阿婆装（黑色或是蓝色的朴素的衣服）和凉帽被



照片4 山打根客家会馆保存的凉帽
(2012年，笔者摄影)。



照片5 山打根客家会馆保存的笠麻
(2012年，笔者摄影)。

认为是客家的传统服装。加上，客家男人以前在从事农业时戴的笠麻（帽子的一种）也被认为有客家特色。

这些服装在山打根客家公会的文物馆有展览。山打根客家公会的干部说，福建人和潮汕人因主要做生意一般不会用这些，所以阿婆装、凉帽、笠麻都是客家特色。他们一看穿阿婆装带凉帽的妇女就认为是客家人。我在山打根、亚庇、丹南都听说，这些服装都是在70年代之前存在，但现在几乎没有人用。可以说，这些服装是提及客家文化特色时，他们所强调的传统客家文化。

（2）饮食

我们有时会在中国、台湾、新加坡、印尼等地的街上看到客家菜馆。可是，在沙巴很少看到菜馆挂“客家”牌。据我所知，沙巴的首都亚庇和客家比率高的丹南没有客家餐馆。我在亚庇和丹南问很多人客家餐厅在哪里，但他们都说没有，部分人说某某餐厅会提供客家菜。但其他一些人说，现在华人吃的东西差不多，没有客家人专门做的。

然而，在沙巴客家人的观念中也有客家特色菜。我在沙巴问“典型的客家菜是什么”时，很多人回答说典型的客家菜就是芋头扣肉、酿豆腐以及春卷。客家会馆（包括上述的沙巴大埔会馆）举行活动时妇女们做的客家菜一般包括这三种。丹南的客家人还指出，除了芋头扣肉、酿豆腐、春卷之外，肉圆、狗肉、酿冬菇、白切鸡也是典型的客家菜。我在根地咬时当地人提供的客家菜也是芋头扣肉和白切鸡。另一方面，他们认为烧肉和叉烧是广东菜。

扣肉、酿豆腐、肉圆、狗肉在中国也经常被认为是典型的客家菜。但是，这些菜与中国的不同一定一样。例如，沙巴几乎没有梅菜扣肉，基本上都是夹芋头做的（但是芋头扣肉在广东也有）。酿豆腐与广东一样，在豆腐里放肉，但沙巴的酿豆腐非常大（照片6），比广东的差不多大两倍。肉圆、狗肉的味道也与广东的不同。另外，白切鸡一般在广东被认为是粤菜，但在沙巴往往被认为是典型的客家菜¹²⁾。我在沙巴觉得意外的是，大部分的沙巴客家人认为春卷是最典型的客家菜之一。因为我在广东很少听到春卷是客家菜。我有机会在丹南吃春卷后发现，其实这里的华人说的“春卷”是“蛋卷”（照片7）。与梅县的客家话同样，春意味着蛋。但是，我在梅州、河源、广州等很少看到同样的食物。但是，后来我去惠州时得知，惠州的市场也有卖蛋卷。虽然形状不



照片6 亚庇的酿豆腐
(2012年，笔者摄影)。



照片7 丹南的春卷
(2012年，笔者摄影)。

同，有可能蛋卷是惠州人把它传到沙巴，在当地开始被认为是客家菜的。

但是，关于什么是客家菜的说法因人而异。不少人跟我说，由于沙巴大半是客家人，沙巴的中国菜也是客家菜。有的年轻人说的客家菜包括春卷、肉丸、干捞面以及烧肉、叉烧。另外，一些人认为客家人做的家庭菜都是客家菜。山打根的一些人跟我说，他们在家庭很少吃春卷和酿豆腐，这些不是客家菜。他们认为的客家菜包括猪肠和木耳炒肉等。山打根有一家叫做“品味客家茶餐厅”用了“客家”两个字，是山打根客家会馆会长的妹妹开的，他们是东莞出身的客家人。这个餐厅把老板的妈妈做的家庭菜作为客家菜提供给客人。这座餐厅提供的客家菜包括扣肉、猪肠、猪脚、木耳炒肉等，但没有酿豆腐和春卷。

虽然在沙巴什么是客家菜根据地区或者个人稍微不同，但是客家会馆举行活动时经常提供的客家菜有芋头扣肉、酿豆腐、春卷，以及肉圆、狗肉、酿冬菇、白切鸡等。虽然这些菜已经不是客家人平时吃的或者不只是客家人吃的东西，但是在特别的日子有时被强调为传统客家菜。

(3) 建筑

客家文化以圆形土楼、围龙屋、四点金等特色建筑而出名。所以，我去沙巴考察客家文化时很想知道沙巴的客家建筑有什么种类。可是，如在上面所述，沙巴客家人的大半一直都住在都市里，并且现在他们与其他华人，甚至与原住民杂居。目前，很难在沙巴找到客家人住的传统民居。

但沙巴客家人有时主张“山芭屋”就是沙巴的客家民居。一般来说，山芭屋是用木头做的两层房屋。我在山打根看过的山芭屋是第一层用作仓库或者车库，第二层用作人住。而在丹南看过的山芭屋是第一层和第二层都是人住，旁边设仓库（照片8）。山芭屋基本上是用木头做的，分为几个种类。

据说，沙巴客家人60年代之前住在用植物的叶子和木头做的“亚答屋”，但现在已经不存在。山芭屋是二战后到80年代期间客家人住的，但现在很多客家人住在水泥建筑中，住山芭屋的很多人是原住民或是移民。虽然沙巴还没有把山芭屋作为旅游开发的对象，但当地的不少客家人认为这是有客家特色的民居。

历史上，沙巴没有圆形土楼和围龙屋。但是，由于沙巴的客家人认为圆形土楼是客家人的象



照片8 丹南的山芭屋
(2012年，笔者摄影)。



照片9 在亚庇建设中的圆楼型建筑
(2012年，笔者摄影)。

征,沙巴客家人在亚庇的郊区开始建设模仿圆形土楼的现代建筑。这座建筑本来是计划用作客家联谊会的会场,但后来因种种理由而延期建设(照片9)。2012年8月当时这座建筑还在建设中,虽然可以看到圆形土楼的基本框架,还没有做壁墙等。

(4) 信仰

可能沙巴的客家文化与中国大陆的客家文化最大的差异,是因历史原因造成的。沙巴的很多客家人信基督教或者天主教。沙巴也有全球客家福音教会。根据C牧师的推测,沙巴客家人中约有30%是基督教徒,特别是巴色会的信徒比较多。现在在沙巴有七、八万巴色会信徒,其中原住民约两万,华人约四五万,华人的80%是客家人。另一方面,不少沙巴客家人是佛教徒,但他们说的“佛教”往往指广泛的民间信仰,他们除寺庙外还会去道教或者民间的庙宇。与基督教和“佛教”相比,信伊斯兰教的客家人很少。因为,伊斯兰教徒的宗教实践与不能吃猪肉等与华人的生活方式十分脱离。除非他的配偶是马来人或者原住民,信伊斯兰教的华人几乎没有。可以说,沙巴客家人的宗教信仰中,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以及“佛教”者占多数。

根据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义,客家人不能用中国的方式拜祖先。这可以说是信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华人遇到的矛盾。例如在香港,信基督教的村落要放弃作为中国人的“正统”仪式(Constable 1994)。那么,沙巴客家人的情况如何呢?根据我在沙巴的考察,沙巴的基督教徒有两种拜祖先的方式:一是基本上放弃供三牲、烧香、放鞭炮等中国的方式,用蜡烛、鲜花等基督教的方式拜祖先;二是每周日去教会拜基督,但只在拜祖先时用中国的方式。我在亚庇访谈的E先生时发现后者是典型的例子。他是从祖父的世代一家加入的基督教徒,但清明节时仍然在义山的坟墓供三牲、烧香、放鞭炮拜祖先。加上,E先生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还回去德教的庙。他的信仰可以说比较接近民俗宗教(渡边1998)。但不管怎么样,沙巴的不少客家人重视基督教。

虽然不少客家人成了基督教徒,从中国大陆来看这是沙巴客家人的特色之一,但我在沙巴的民间社会考察时他们强调的“客家神”不是基督教,也不是天主教。因为,沙巴的其他华人也信基督教和天主教。反而,他们说的客家特色信仰在民间信仰(一些人说的“佛教”)里表现出来。沙巴客家人会说哪个是客家的信仰或是哪个是广府人的信仰或者闽南人的信仰。

如果在台湾,一听到客家的信仰就会想起三山国王以及义民爷。因此,我在沙巴考察时问过很多人关于三山国王和义民爷信仰。但结果连一座三山国王庙和义民爷的庙都找不到。甚至我说“三山国王”和“义民爷”时很多人没反应,我以为我华语的发音不好,但后来知道他们从来没听过这两个神明。由于沙巴的不少人到台湾留学过,他们告诉我沙巴没有三山国王和义民爷,砂拉越才有三山国王庙。那么,他们认为的客家神有什么呢?在沙巴的很多地方,大伯公被认为是客家人的神明。

例如,在亚庇,位于沙巴南边的碧南庙把妈祖作为主神,这座庙在当地被认为是福建庙。但亚庇的大伯公庙被认为是客家庙。我拜访过亚庇西郊、离飞机场比较近的大伯公庙。其实,除了客家人之外其他华人和原住民也过来参拜,但因客家人建庙而被认为是客家庙。在丹南,华人主要信仰的庙有观音庙、大伯公庙、杨太伯公庙、广福宫、玉宝庙、斋公庙、七圣仙师庙,其中前三者被认为是客家人主要信仰的对象。观音庙和大伯公庙在沙巴到处都有。但是,杨太伯公庙在



照片10 丹南的杨太伯公庙
(2012年, 笔者摄影)。



照片11 山打根的谭公庙
(2012年, 笔者摄影)。

沙巴少见。根据B先生说明,杨太伯公庙(照片10)的主神是杨筠松,是有名的风水大师。杨筠松在丹南被认为是风水神,当地客家人建房子的时候拜这位神明¹³⁾。

但是,在信仰方面沙巴好像还没形成共识。与亚庇、丹南不同,大伯公庙在根地咬被认为是福建人的信仰对象。根地咬的伯公庙是1950年客家人、四邑人、福建人等不同祖籍的华人共同建的,一直由这三个族群轮流管理。可是,由于大伯公被认为是福建神,这座庙也被认为是福建庙。另一方面,山打根的客户人认为大伯公和观音是客家人的神明¹⁴⁾。这一点与丹南的情况差不多。但对山打根的客户人来说最大的文化标志不是大伯公庙,而是谭公庙(照片11)。据说,谭公庙是1876年建的庙,已经有136年的历史。这座庙的主神是谭峭,出生于惠阳,是有名的数学家,救过很多人。早期惠阳人到海外移民时带着谭公信仰去,现在惠州的九龙丰和香港的筲箕湾也有庙。目前山打根的客户人有时到故乡的惠州举办活动。谭公在山打根被认为是客家神¹⁵⁾。

结语

根据我在当地的考察和相关文献,本文阐明了马来西亚沙巴移民的源流、移民史、认同感、文化标志等基本概况:

第一,自从19世纪以来沙巴的大部分客家人从广东中部和东部,特别是从东江流域一带移民到沙巴。客家人从广东移民到沙巴时,巴色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巴色会主要在广东的客家地区传教,一开始到沙巴移民的大部分华人是客家人。他们经过亲戚和朋友的关系陆续移民到沙巴。结果,客家人在沙巴成为最大的方言集团。

第二,由于沙巴有从不同地方移来的客家人住在一起,移民后形成了以宝安方言为标准的客家话。随着时代的演变,沙巴的客家人逐渐忘掉自己的祖籍地,以作为共同方言的“客家话”为标准形成了客家认同感。与中国大陆的东江一带相比,沙巴客家人很早持有作为客家人的认同感。可以说,在不同方言集团冲突的海外华人社会,更加容易产生客家意识。

第三,除了语言之外,沙巴客家人开始持有作为客家人的文化标志。他们把凉帽等传统服装,扣肉、酿豆腐、春卷等传统饮食,山芭屋和土楼型建筑等传统民居作为共同文化标志是典型的趋势。另一方面,虽然沙巴客家人还没把三山国王和义民爷等作为典型的文化标志,他们认为的客家神根据地区差异有所不同。但另一方面在他们当中开始出现了把大伯公看做客家神的倾向。

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情况不同,沙巴还没采取以客家文化推动地方经济的政策,除部分报纸报道外,很少通过媒体宣传客家特色的文化。可是,我们已经注意到,沙巴客家人在还没推动制定客家文化政策之前,已经有分别那些现象是客家的,还是其他华人的文化认同。虽然还没形成全土共同认可的客家文化,但假如沙巴政府或者商人更加注重用客家文化推动地方经济的话,这里的文化标志也许会变化¹⁶⁾。我们今后可以以本文的内容为基础探讨沙巴政治经济条件的变迁和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

另外,从本文的报告可知,虽然沙巴客家人主要从东江流域移民过来,一些生活文化与原乡的有所不同。一方面,沙巴的客家人通过谭公庙等信仰活动与中国广东的生活文化发生联系。我们从本文的个案可以知道两国之间的部分关联性。但另一方面,沙巴客家人开始不看重自己的祖籍地,而追求“共同”的客家文化(如圆形土楼、宁化客家祖地)。如在本文开头所述,目前的客家研究很少关注中国—东南亚之间超越地区的时代网络。因而,我们还不清楚为什么沙巴和原乡的客家文化发生差异。本文通过探讨沙巴客家人的移居、认同感、文化标志,弄清了东南亚及其中国原乡之间的关系,但是今后还需要关注跨越海外客家华侨社会和中国原乡客家社会的网络。

附记:本文是通过根据《客家研究辑刊》2013年第一期刊登的《马来西亚沙巴州的客家人——关于移民、认同感、文化标志的初步报告》修改而成的。《客家研究辑刊》是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的内部刊物,没有版权,按规定允许在别的学术杂志正式投稿。特此说明。

注

- 1) 我在沙巴时承蒙了伊藤真老师、岩濑先生及其妻子王淑芬女士、丽英小姐的种种照顾及厚谊,在此谨致谢意。我在沙巴考察时得到沙巴大埔会馆、亚庇客家公会、山打根客家公会、根地咬客家公会、丹南客家公会的热心帮助才能够做大有意义的考察。在此,我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 2) 关于笔者的多地点考察方法,请看《都市调查与多地点民族志》一文(河合 2017)。
- 3) 笔者在田野考察的过程中发现,沙巴的不少华人认为卡大山族也是中国人。有些人说卡大山族起源于云南少数民族;也有些人说卡大山族是从台湾阿里山来的少数民族。
- 4) 山打根客家公会的干部告诉我,现在该会馆有约5,000人会员。最近在郊外建设大型的活动场所里举行婚礼或者春节、三八妇女节、双亲节、中秋节等活动。
- 5) 根据2012年8月16号原中学教师杨先生的回忆。杨先生是龙川人。1930年他的父亲从龙川到古达。他父亲先到山打根、斗湖,后靠他父亲的哥哥(巴色会教徒)再去丹南。他说有一些客家人直接从广东移民到丹南。
- 6) 张德来:《沙巴的客家移民实验》,2007年。2012年8月13日我跟张德来先生见面时他说他本身是德里福

的五华人，这一带是客家居住地。

- 7) 1976年斗湖客家公会提出建立沙巴客属联合会，同年11月改称沙巴客属总会。各客家团体每两、三年在沙巴共同举办一次。2012年8月18号我参加了在亚庇举办的第15届客联会。
- 8) 2012年8月17号我在根地咬客家会馆的访谈。
- 9) 虽然沙巴也有不少“龙岩人”，但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客家人。我在沙巴问过三位“龙岩人”他们的祖籍地是龙岩市区还是长汀、上杭、永定等西边的县，但他们都不清楚，只知道他们的祖先是来自龙岩过来。他们认为自己的语言与客家话、闽南话都不同。沙巴也有龙岩会馆和福建会馆。沙巴人说的“福建人”是闽南人，主要从永春、安溪、厦门、龙岩过来，沙巴也有福州会馆，“福州人”不被包括在“福建人”的范围里。我以后需要到龙岩会馆和福建会馆调查会员的具体祖籍地在哪里。这是我今后继续研究的课题。
- 10) 2012年8月我在亚庇时不少客家人还认为大埔人不是客家人。
- 11) 关于客家人从事的职业，请参见 Han: S. F.: A Study of the Occupational Pattern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abah, Malaysia.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hD Thesis, pp. 122-146, 1971. 另外，亚庇的的士司机大部分是武吉士人和华人，华人中则多数是客家人。
- 12) 广西玉林的客家人也往往把白切鸡认为是典型的客家菜。玉林地区（包括博白、陆川）的餐厅有提供“客家白切鸡”，味道与广州、香港的差不多。
- 13) 杨筠松在赣州一带有很多救人的传说，最近赣州把杨筠松作为旅游开发的资源。但杨太伯公庙的周围是龙川杨姓人，还不太清楚这座庙经过什么途径被龙川人修建的。不管怎样，这座庙与赣州一样被当地人认为是客家人的庙。
- 14) 山打根的三圣宫是比较出名的华人庙，不少客家人到这座庙参拜。但是，一般华人认为这座宫庙本来是广东人（包括广府人和客家人）共同的会馆，不认为三圣宫庙是客家人特有的信仰对象。
- 15) 根据笔者的田野考察，越南胡志明市也有谭公庙。胡志明市的谭公庙由惠东宝同乡会（惠州、东莞、宝安的客家同乡会）管理，所以谭公往往被当地的华人视为是客家神。
- 16) 2019年第30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将在马来西亚举行。这几年沙巴的客家团体开始强调新的客家文化。例如，2018年3月上旬沙巴客联会举行天穿日沙巴客家文化节。这是从台湾传过来节日。

参考文献

(中文)

北婆罗洲客属公会特刊编辑委员会编

1957 《北婆罗洲客属公会新会所开幕纪念特刊》香港：伟兴印务所。

渡边欣雄

1998 《汉族的民俗宗教》周星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李志刚

1994 “香港客家教会（巴色会）之设立及其在广东与北婆罗洲之传播”载谢剑，郑赤琰编：《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pp. 1241-1252，香港：香港中文大学。

饶尚东

2002 “东马客家移民史略”，载郑赤琰编：《客家语东南亚》，pp. 68-72，香港：三联书店。

汤咏诗

2002 《一个华南客家教会的研究——从巴色会到香港崇真会》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

张德来

2002 《沙巴的客家人：客家华人贡献沙巴州现代化之探讨》亚庇：沙巴神学院。

2007 《沙巴的客家移民实验——客家人南来夏南南，孟家达，德里福开埠九十周年纪念特辑》亚庇：

Sabah Theological Seminary 出版社。

(日文)

上東輝夫

1999 『東マレーシア概説——サバ・サラワク・ラブアン』 東京：同文館出版。

2004 「マレーシア・サバ州の華人社会形成の歴史と現況」『NUCB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49(1): 241-252。

河合洋尚

2012 「東江客家文化の創出と景観建設——広東省河源市を事例として」瀬川昌久、飯島典子編『客家の創生と再創生——歴史と空間からの総合的再検討』pp. 142-144, 東京：風響社。

2017 「都市調査とマルチサイト民族誌」西澤治彦、河合洋尚編『フィールドワーク——中国という現場、人類学という実践』pp. 369-391, 東京：風響社。

瀬川昌久

1993 『客家——華南漢族のエスニシティーとその境界』東京：風響社。

長津一史

2006 「イスラームの制度化と宗教変容——マレーシア・サバ州、海サマ人の事例」『南太平洋海域調査研究報告』43: 45-69。

山下清海

1987 『東南アジアのチャイナタウン』東京：古今書院。

(英文)

Constable, N.

1994 *Christian Souls and Chinese Spirits: A Hakka Community in Hong Kong*.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Jones, L.

1962 North Borneo: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Population taken on 10th August 1960. Kuching: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Han, S. F.

1971 A Study of the Occupational Pattern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abah. Malaysia.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arcus, G. E.

1995 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4: 95-117.

Wong, D.

1998 *The Translation of an Immigrant Society: A Study of the Chinese of Sabah*. London: ASEAN Academic Press.